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

——学习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所蕴含的科学内涵、理论价值、发展逻辑、文明动力、实践意义等，党的二十大闭幕后，本刊编辑部第一时间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多维度的学理阐释，希冀更好地提炼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学术范式，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战研究员指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世界与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道路的历史探索与发展展示了传承与接续，其内涵性突破在于塑造了迥异于西方现代化、可资广大后发国家借鉴的崭新范式。韩庆祥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时代化与化时代的统一，具有四重内涵——体现时代精神并把握时代特征，吸收时代成果并达至时代水平，反映时代要求并解答时代课题，把准时代脉搏并引领时代发展。张翼研究员指出，“并联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在后工业化意义上表现出强烈的数字化浪潮，显示出“数字中国”的特质，数字精英的生产机制和数字社会的秩序相应也发生结构性变化，需要通过治理方略的因时而动，进一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陈恒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学术的再现代化，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人类其他文化遗产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发展，构建学术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思想。面对文明新形态的“知识状况”与“世界状况”，重新构建世界学术体系已成为可能。陈忠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世界文明的理性自觉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需要以开放、弹性、包容的态度，不断探索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开放包容、面向未来的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新样态。何勤华教授认为，法治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蕴涵，要以法治的方式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规范有序进行，排除中国式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热情。周敬青教授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党的重要制度规范体系，需要进一步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规范界定、强制惩戒、激励引导、约束监督等功能，以高效的自我革命坚定有力地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瞿骏教授指出，如果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主动”相结合，百余年的历史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四组关系具有广阔阐释空间——主动研判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平发展之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模式以及文明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超越。金瑶梅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蕴的价值指向突出表现为三重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身的和解。

——主持人 叶祝弟 李梅 孙冠豪

世界中国学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历经改革开放以来 40 余年的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呈现出创新发展新气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系统归纳和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与中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此意义上，新时代十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在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凝聚了改革开放 40 余年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丰富经验，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了创新发展，促使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全面脱贫、经济实力跃升、各行业领域创新发展等方面成就显著，顺势而为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历史的探索目标。国内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为开展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探索，开始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后结合中国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 30 年的艰辛探索为后续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教训，也奠定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至党的

二十大召开的 40 余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探索，开启和发展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中国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百姓小康的战略目标，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独立和民族发展的坚定信仰。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国情相结合，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扫除了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社会建设的新探索，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一道路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新的里程碑。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今的崭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实践。社会主义的提出、发展与实践，经历了约 500 年的发展历程。圣西门、傅立叶等描绘了美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确立其实践精神。俄国布尔什





维克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前半叶，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风起云涌。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后，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中国实现全面脱贫，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一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人类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传承至今。一些西方学者亦赞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续写中华民族发展的辉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促成中华民族在百年颠沛之后重新走向富强的关键因素，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以伟大变革为内在特征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传承与接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与发展

遵义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此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促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历史传统的延续。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毛泽东是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启蒙者，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以及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的宏伟构想。工业化正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周恩来在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这是共产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表述。此后在1957年、1964年、1965年，周恩来相继对“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进一步阐述。改革开放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新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渡，并奋力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中国当代现代化成就，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创新型与高质量发展之伟大成就的理论集大成。

第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承接着改革开放前后30年内联系的发展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进入新时代，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初始积累。第一阶段的初始积累（1949—1978）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统购统销。虽然该时期的初始积累为中国快速建立起大工业体系作出巨大贡献，但也导致8亿农民被固定在相对低效的农业部门，使得近30年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只能惠及少数的城市居民。第二阶段的初始积累（1979—2012）主要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建设。通过低价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通过旧城改造等，完成了30万亿美元的第二阶段初始积累，从而快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为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经贸体系积累了必要条件。如果将其放在170年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过程中可知，中国始终都在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正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言：“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页。

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①只有辩证地认识两个阶段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建立在中国历史和国情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特色，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70年发展成就的新起点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和接续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东方与西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性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深厚的理论底蕴及其普遍适用性塑造了现代化的崭新范式，为广大后发国家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模板。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包括五大方面：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14亿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注重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与保护地球相统一的现代化；是追求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既涵盖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价值，又具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底色，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表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等表述中，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相统一，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全人类的发展等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藏的共同价值，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发展具有借鉴性和吸引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幅员广阔，人口巨多，地区之间在地理面貌、产业布局、习俗观念、发展水平等方面迥然相异，基于此种复杂国情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着对社会多样性的强大包容力和掌控力，中国国情的丰富与多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兼容性的增加。基于区域与

人口复杂国情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智慧结晶，对广大亚非拉美等洲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探索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启发意义。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局限性的现代化。我们不可否认此前西方现代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和体制突破，改变了传统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然而，西方式现代化筑建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基石，相对更注重自我发展，显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狭隘性。其过于依赖“看不见的手”，也会产生垄断加剧、贫富分化、资源配置浪费、生态破坏、社会发展失衡等弊病，有些弊病更是积重难返，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问题。从数十年的实际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在他国推行的现代化模式并未为其国家社会发展和广大百姓福祉带来整体性的改观，反而在近年陷入发展陷阱，其现代化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撕裂现象。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政坛更迭频繁、选举党派无绝对优势，这多少反映了其社会民众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进社会发展和建设、提升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力求克服“看不见的手”的弊端，以社会的整体发展来反哺经济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期在结果公平追求、社会均衡发展的约束下求解效率的最大值，因此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最终只能维护少数集团利益的局限性，显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性。

从外溢性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伴随着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掠夺、人口奴役、环境破坏。即便到了当代，全球金融危机也多次发生，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全球资本的逐利性造成以邻为壑、缺乏协调，甚至带来战争。而中国希望将发展的红利与世界分享，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西方现代化造成的人类发展困境，这植根于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思想理念，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带来了希望。

概言之，西方社会科学建构出一套诠释西方现代化“正确与真理性”的话语体系，却让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陷入困顿和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成功实践，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现代化模式及其话语解释体系，是对全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有益补充。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应该服务于全人类发展，而非由中国独享。当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全世界遭遇水土不服、话语失效，中国推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套理念、制度方案和实践经验，这种与世界分享的开放胸襟彰显了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国情怀。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亚洲国家相继崛起的新高度。西方的率先成功确实带给发展中国家和东方国家一些借鉴。比如日本在亚洲首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激发了包括亚洲四小龙、东盟、印度等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和发展。当前从整体实力而言，东西方经济实力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逆转，世界发展呈现新格局。

但我们也要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靠照搬照抄某种模式获得持续成功。例如，明治维新变革之后快速发展百余年的日本，今天也在深刻反思失去的20年，这20年的停滞与其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不无关系；反之，韩国、新加坡等国结合自身实际的有为政府与宏观产业引导等举措使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

持续增长，支撑其发展的要素中更多是自身作为东方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换句话说，亚洲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带有源自历史的亚洲特征，但缺乏对这些现代化特征的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也是对亚洲国家现代化内涵的重要概括和引领。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结合本国实践，亚洲其他国家也可以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现代化图谱。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得到世界赞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得到世界各国政党官员、智库专家、学院派学者、企业精英等的广泛关注。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私有经济并非金科玉律。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在于，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强行向世界各国推行自身价值观，而是奉行求同存异的原则。曾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亦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本国国情发展的卓越表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进步事业有巨大贡献，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和平稳定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国家基于本国国情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迈入全面小康、正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斯塔夫里阿诺斯批评“中国民族主义”论，认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众，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走了一条重视民众需求、以群众路线为特点的延安道路，是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的发展模式。

当今的中国，是源自历史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民共享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人类和谐发展，体现了对传统中华文明中“安居乐业”“天人合一”的深度思考与有效实践。以邻为比，继往开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为全球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①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褚艳红对本文写作具有重要贡献。

时代化与化时代

——兼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涵义

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重大论断，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的重要文献和典型样本。本文拟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框架，从“时代化”和“化时代”统一角度入手，着力从学理上探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涵义。

首先，我们需要理清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时代化和化时代的关系？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思想是时代的声音，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时代”是与哲学、面向未来、放眼世界直接相关的范畴。时代化，主要包括用哲学和世界眼光，来体现时代精神并把握时代特征、吸收时代成果并达至时代水平、反映时代要求并解答时代课题、把握时代脉搏并引领时代发展四种基本涵义；化时代，主要指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进而推进时代发展进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推动中国发展进步，从而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它是“中国化”和“化中国”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发展相结合，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分析时代特征，解答时代课题，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回答，

得出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科学认识，形成达到符合时代发展水平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并推动时代发展进步，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时代特色，夯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让马克思主义牢牢扎根于时代发展进步潮流之中，它



是“时代化”和“化时代”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于立足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侧重于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大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创新成果，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也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体现时代精神并把握时代特征

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层涵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要体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18页。

时代精神，这是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关键在于它符合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及时捕捉时代发展主题，回答时代紧迫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真正的哲学。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代发展的本质联系，体现时代精神。当今世界和新时代中国实践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动力、平衡和谐与国家治理相统一的问题，给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既反思过去，又审视现在和展望未来，以真正的哲学方式来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做到既要有批判性精神，又具有建构性主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愿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际展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弘扬时代精神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体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体现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懈追求中。它聚焦并回答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从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还要把握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是通过时代特征体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从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解决体现时代特征的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太平不太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具有生机活力”等根本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也显示出新的时代特征。它在新时代的中国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世界上主要表现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进程中，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趋突出，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力量在转移，世界格局在调整，世界话语在重构，处在“变革与重构”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剧，而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逆全球化倾向；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更加急速地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日趋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相互激荡；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面对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及其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进一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积极回应和科学回答，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深刻研判，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时代发展趋势，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和反映人民愿望，

既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吸收时代成果并达至时代水平

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二层涵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成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时代产物，只有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赶上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时代性，它总是与世界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相联系的，总是在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外来文化。毛泽东说：“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①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研究和汲取世界科技和文化成果，以及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理论养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从中国实践发展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就是从世界发展大势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今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是前人难以想象的。一方面，时代变化使各国发展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变化又使世界发展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当今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严峻挑战，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时代主题变迁，着力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提出的各种难题。我们需要站在科技发展最前沿，敏锐把握信息、生物、医疗生命等方面的科学技术重大突破给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的深刻影响，善于运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内涵。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

战，创造吸收时代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范畴新论断，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话语，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关乎当今世界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的主张。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胸怀天下的博大襟怀，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深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认真研究世界资本主义运行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优秀成果，主动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社会变革和西方各类思潮的挑战，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达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不断吸收新的时代成果，目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达到时代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不封闭保守，否则会停滞不前；也不固步自封，否则会教条僵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品格，就是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发现真理、践行真理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守正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还需要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上共同努力。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今天，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先后有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00多年来，我们党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以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3页。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以胸怀天下眼光紧跟时代潮流，如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新走向，注重人类文明范式新转换，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尤其使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①

反映时代要求并解答时代课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三层涵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要反映时代发展新要求。就中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并反映时代发展新要求的突出问题。首先要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体现的是“总体—五位一体—共同体”的逻辑思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体”要求，它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是根本遵循，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历史进程中得以体现；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框架中加以强调的，是基本遵循，应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的是“共同体”理念，应在实践中自觉坚守并积极推进。就世界而言，反映时代发展新要求，就要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风险挑战，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解答时代课题。反映时代要求，就需要进一步回答“时代之问”。理论有没有价值，关键看它能不能科学解答时代课题，回答“时代之问”。只有及时有力地回应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积极解答好时代课题，理论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当今世界而言，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全球化逻辑和资本逻辑。马克思花费毕生精力所进行的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表现出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和震撼力。尽管随着冷战结束和发达国家福利社会政策的实施，马克思时代那种以激烈的阶级对立和暴力斗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良，但“资本逻辑”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多样的手段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粉墨登场，由此造成了诸多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发生。在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化风险中，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资本的影子。比如，贫困增加、人口膨胀、高耗能高污染等发展问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淡水短缺、能源短缺、粮食短缺等资源环境问题；政治霸权与价值冲突、文化交锋与宗教冲突、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民族种族矛盾、核扩散、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问题；俄乌军事冲突等国际问题。这些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某一方面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系统性问题，各种困境和冲突实质上折射出人类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与心等方面出现了深刻危机。在这种情境下，“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如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中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这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既是提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也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站在全球化高度，直面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国际听得懂的语言，对世界变局和时代发展作出清醒的理论判断，对世界发展和时代发展作出科学阐释、发出中国声音，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

就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反映时代要求，就需要进一步解答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时代发展新要求，迫切需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回答影响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时代课题。这样的时代课题实质上就是解决“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问题。其中最引人关切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充分利用市场、资本的力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批判和抑制资本逻辑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等各种不平等现象，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真正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把准时代脉搏并引领时代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四层涵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把准时代发展脉搏。准确来讲，就是要对时代或世界发展状况即态势和大势作出准确且科学的研判。尽管“不稳定、不确定”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征，但这个世界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必然呈现由这一规律所支配的发展态势。当然，这需要以大历史观和战略思维进行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①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讲的是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意义。只有树立纵深而宽广的大历史观，才能将时代或世界发展态势和大势看得更清、追得更远、思得更明、悟得更透。

从学理哲理来讲，所谓大历史观有四层涵义：一是在时间上，它跳出一定历史阶段，把历史阶段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历史长河中来把握，这是长远史观和长远视野；二是在空间上，它跳出一定历史空间（或历史局部），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历史空间（历史局部），这是世界史观和宽广视野；三是在主题上，它跳出历史片段、历史细节和历史碎片，用历史主题把历史片段、历史细节、历史碎片统领起来，这是整体史观和整体视野；四是在本质上，它跳出历史现象，走向历史深处，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抓住历史本质，探究历史规律，这是规律史观和纵深视野。

我们可以把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理解和把握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之态势和大势。这种态势和大势，就是在“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时代，具有天下胸怀和世界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也一定能够积极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进而“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②也一定会呈现“世界向我”的发展趋势。就这方面来说，它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还要引领时代发展。把准时代发展脉搏，就是为了引领时代发展。引领时代发展，既包括“跟着时代走”，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又包括“领着时代走”，即引领时代。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高瞻远瞩，科学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 63 页。



律，自觉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社会发展和变革提供先导。马克思主义已经从“过去”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当今”走向“未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行动的思想基础，就在于它的基本原理具有跨越时空的真理性，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又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引领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党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前途和命运的把脉，就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思想指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脉当时中国情况，由此提出的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合理借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为积极主动地引领时代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和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得到了世界诸多国家的关注与认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在世界发展中释放了巨大的中国影响力，在深刻变化的世界形势中也引领着世界发展潮流。我们积极推进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质就是主张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与世界共发展、与世界同分享。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也展示了胸怀天下的全球性思维，体现了普惠天下的大党胸襟和大国气概。我们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基本理念，提出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这些都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面前，作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头羊，中国必须具备世界性视野和历史前瞻性，坚持胸怀天下，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把握住世界历史发展方向，辨清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合理应对全球化中的诸多问题，在与全球思想对话、交流中传播、唱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谱写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站在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高度，基于对世界发展态势和人类发展大势的理解，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等重大论断。^①这是对时代发展脉搏的准确判断，也是对引领时代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上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新时代中国未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实质上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指明正确方向、引领前进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新范式，它高于西方式现代化，既能克服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弊端，又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正确方向并展现光明前景，还能提升人类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推动人类文明进步。^②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第16页。

②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21&ZD011)；同时，也吸收了陈远章教授的一些观点，在此致谢！

并联式现代化、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打破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创造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尤为可贵的是，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格局，开创了人口规模巨大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先河。

并联：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转型

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探索。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掀起过洋务运动、立宪革命、辛亥革命等，虽然推翻了帝制，现代化却仍然在曲折中徘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将人民组织起来，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从而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推进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性制度基础。肇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序幕，制定了持之以恒建设小康社会的“三步走”战略，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时代以来，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努力破除前进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迅速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

给侧改革为主线，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消除了千百年来羁绊农村发展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中，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迅速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从定居社会向迁居社会、从成年型人口向老龄型人口、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从小康社会向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重大转型。到 2021 年，在三类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中，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7.3%。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 2021 年仍增长到 53.3%。当前，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与疫情跌宕起伏的交织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会在波动中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会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继续上升。中华民



族已步入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在科技革命的促动之下，伴随智能机器人与无人车间的广泛使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将继续大幅提升。

但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还需看到，与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相比，中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占比仍然较高。在2020年，中国仍有23.6%的“劳动参与人口”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社会转型相对还滞后于经济转型。考虑到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偏大，收入相对较低，农业机械化水平处于迅速提升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富有预见性地讲，在未来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土地会在集约经营中经过合法流转而趋于集中，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也会迅速提升。这会激励更多受过专门培训的职业农民进入农业领域，最终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过程，由此也会逐步减少自家庭联产责任制实施以来的农户种植农数量。

也就是说，在强大的城镇化浪潮中，不管是自然村的数量，还是行政村的数量，都会在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中迅速减少。回顾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推动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或者说解放区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工作，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农村农业农民革命。随后的集体化运动，即在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基础上，国家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等集体农庄制度，是国家第二次对三农问题的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历史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进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是国家第三次对三农问题进行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当前正在推进的、与城镇化密切结合的以土地流转与农业现

代化为主的改革，是国家第四次对三农问题推进的改革。在14多亿人口的大国，只有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相结合同步推进，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

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是“串联式现代化”，是在率先工业化的前提下，逐步推动城镇化、电气化、信息化和后工业化。中国只有经过奋起直追，才能在跨越式发展中从“跟跑”转变为“并跑”再形成“领跑”之势。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表现为一个“并联式现代化”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伴随着一系列战略的实施，也伴随科技含量的提升，第二产业产值与从业人员占比会逐渐稳定于某个合适的数值（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为保障国家安全，可能至少得使其高于20%）。^①而唯有坚持走“制造强国”之路，才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然，没有乡村的振兴，现代化的短板就难以补足。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在社会转型意义上凸显出新兴高科技部门，尤其是与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等相关部门的结构性发展优势，使中国社会在后工业化意义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数字化浪潮，显示出“数字中国”的特质。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特点，是雄厚的国内市场对新产能与新业态的支持。科技一经规模化市场接受，就会转化为强大的成本降低态势，从而形成价格竞争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数字精英问题：教育扩张、科技进步与就业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拉动的经济大发展，正逐步促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现代化的推进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发展阶段的转变速度。这个转变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科技应用与科技普及程度的提升。在国家层面，则主要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当科技创新所决定的生产力升级到更高水平、并对原有的产业结构产

^① 在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即在第一阶段的非农化和工业化影响下，农业产值和从业人员占比会趋于下降，而制造业产值和从业人员占比会趋于上升。但在第二个阶段，即在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也即服务业产值与从业人员占比会趋于上升。

生“颠覆性破坏”，相对于前一时期发展水平更高的那个阶段将会到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论述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问题，并着重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引导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利用科学创新和新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潜在生产力释放出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时间的缩短、化石资源依赖程度的降低、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人工成本的节约，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为新产能对原有旧产能的替代过程。生产领域的革命延伸至社会领域，就是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上层建筑的重塑过程，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科技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推进，都要求伴随生产力的进步而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出适应性改革，否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被套上原有过时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桎梏。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正因为中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创新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思想，通过改革开放比较顺利地调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继往开来的新征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坚持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结合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当前及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最大的中心任务，解决好因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迁而引发的新问题，并基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实际设计好相关社会政策，更高质量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稳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就是因为我們不仅不会因为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发展战略，而且还会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更加强调战略部署的引领作用，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与社会政策的配置上持续发力。

现代社会教育体制改革与人才队伍建设，直接决定着社会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为在当前迅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还需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的扩招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人才生产机制，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推进到大众教育阶段。2022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史以来超过1000万而达到1076万，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伴随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逐步降低，未来的高等教育将更为显著地体现出大众教育的特征。与此同时，大学教育质量的分层或者说名校与一般大学的分层，将会更为明显而又直接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分流渠道。如果把教育视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主体的话，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这个再生产主体的现代化转型。教育在提升劳动者科技素养的同时，还将改善全社会的人文素养环境，强化整个社会的管理能力与秩序化能力，也即，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全面促进整个社会成员的现代化。其中，在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能否尊重科学，能否以科学理念指导实践，是我们能否建构现代化社会秩序体系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现代化水平与“人”的全面发展进程，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与进度。就此而言，管理也是生产力，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在科技进步作为常量的情



况下，由人的全面发展所释放的红利，将会形成更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体的人对数字社会的接受能力，也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这要求我们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同时，还要关注到教育的数字化和文化的数字化的影响，在学态、业态、消费态的加速数字化过程中，促进人对数字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建设能力。当前的数字社会，还只是“人使用人工智能”的社会，未来会发展为“人+人工智能”或“人机合成”的复杂社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数字资源将进一步显现其对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力。

正如工业社会的精英——企业家与科学家联合推动了工业革命那样，在未来的数字社会，数字的挖掘与使用能力、数字的创造与占有能力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商与数字科学家的联合，也会形成新的数字精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解决数字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这个问题在精英教育时代并不十分显化，但在大众教育时代，在教育文凭不具有明确的自动引导精英再生产的时代，其作用将不可小觑。现在，中国每年会招收10万以上的博士研究生，100多万硕士研究生，再加上出国留学归国者，这个数字增长很快。在高等教育的连年扩招之后，预计2023年将毕业1158万大学生。^①在数量供给的迅速提升过程中，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更加强调质量问题。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博士研究生的实际能力相当于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实际能力相当于本科生，本科生的实际能力相当

于大专生，则文凭的贬值现象就不可避免——高等教育承担的劳动力分流能力就会转弱。

如果精英生产机制出了问题，那么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就会形成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不能顺利扩展后工业社会的阶层流动渠道，进而形成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代内滑落与代际下跌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跌宕起伏中，我们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眼下尤其需要解决好“流动阶层”的问题。只有让更多缺少“人脉资源”的大学生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合适的工作，并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才能进一步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不可否认的是，“演员的子女继续当演员，职工的子女继续当职工”现象不在少数，这也因此引发人们更加关注阶层流动渠道闭合问题。近年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影响，“下海”的人职业风险和收入风险意识增强，产生了一种竞相“上岸”之风。事实证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唯有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形成勤劳致富、创造美好生活的体制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使目前这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上岸潮”转化为新时代的“新下海潮”。

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与高考制度的改革，激发了经济与社会活力；开放与外资的进入，激活了市场力量；对个体经济与民营经济的鼓励，增加了新的就业渠道；“下海潮”的出现，拓宽了就业渠道。这也是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基础。而当前这股“下海潮”向“上岸潮”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精英流动趋势，也出现了一些关于“躺平”与“内卷”的讨论。^②这使社会必须更加重视人口转型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转型问题，以及新增劳动力学历结构变化而带来的觅职成本提升问题。如果劳动岗位的供给侧结构难以在求职者的需求侧得到匹配，就会在觅职与就业之间产生摩擦性就业困难，这个问题在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中还可能会进一步放大。

当然，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劳动力人口结

① 2021年全年出生并存活的人口为1062万人。这就是说，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开始低于2022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在出生率的长期降低过程中，今后大学毛入学率将迅速攀升，这将在短期改变中国未来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

② 有关这一现象的讨论比较多，但绝大多数青年都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勤奋劳作，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机遇。

构从以蓝领就业为主向以白领就业为主的转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蓝领工人与白领中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某些特殊技能的蓝领工人的收入超过一些白领中产的收入，这也会加大白领就业人员就业选择的转型成本。这是当前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将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高科技部门一时难以足额创造大学毕业生所需的新就业岗位，新生劳动力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就业难的人群，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主要是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但在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社会，则会突出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

数字秩序：新改革、新发展与新治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衡问题、生活成本高企问题、城市房价与房租居高不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给青年适婚人口带来结婚难、生育难、教育难、养育难和养老难问题。其实，养小和养老也是一种伦理性的家庭收入再分配问题。由于中国的“居民养老保险”相对还比较低，很难单纯依靠养老保险满足基本生活，这就不得不依靠子女养老。^①因此，在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延长的情况下，大多数成年子女需要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这就要求在配套政策的实施上，需要慢转弯，避免一刀切。

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大背景下，如何顺利推进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进一步说，现在主要不是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改革更易于被社会接受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下，在市场的选择性竞争中，人力资本较低的那部分就业人员，通常更希望在弹性退休制度的影响下先行退休；而人力资本较高的那部分就业人员，尤其是体制内就业人员，通常更希望推迟退休，或者在退休后通过返聘继续就业。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解决既拿退休金、又拿就业金的政策措施，这就使得在退休政策转轨过程中，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出现青年一代社会流动渠道堵塞的问题，增加社会的转轨成本。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延迟退休改革与经济周期的相互配合，更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流动渠道阻滞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要把改革当作革命”。^②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可能比革命更艰难。绝大多数改革者面对的困局是：既要维持新生结构的生命力，又要防止反对改革力量的回归，还要警惕某些激进运动打破现有秩序。在发展中国家，改革思想的建构，比革命思想的建构要更为艰难。改革所确立的新的制度配置，实际是对新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合法性的建构。如果社会财富的增量难以维持，或者社会财富出现缩减趋势，则新的利益分配建构逻辑就很难达成一致。相应的利益受损群体或者承担改革成本的主要群体，就难以在改革中分享发展成果，这也是增量改革通常更易于被社会接受的主要原因所在。

此外，还有两个影响改革红利落地的因素：其一，在改革设定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受益群体的预期如果难以达到，则预期受益群体的规模会收缩，希望推进改革的人会在拉锯式的制度配置中持观望态度；其二，对于改革设定的利益受损群体而言，如果其受损程度超过其所能承担的风险，则这些群体反而可能形成背离改革方向的新的利益群体，或者会通过现有制度的强化阻滞未来社会的建构理想，或者会通过传统制度的肯定而力图回归传统架构。因此，改革对既有制度的渐进性改造，务必要在现代化战略的实施中，先建构起形成共识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秩序，再通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财富分配机制，形塑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需要正视的是，由于一些政策配置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机制将会趋于固化，因此过去那种通过某项具体政策的调整，就能够使得全社会普遍显著受益的改革，未来客观上也将变得更加艰难。

① 机关事业单位离休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等，经过一系列改革，基本能够满足日常老年所需。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对较低，尤其在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甚至东部的一些省份。

②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提出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但新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力，终究会冲破原有制度的规约，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中赢得市场、占有市场，形成新产品对老产品的创新型颠覆。市场所创造的财富逐利驱动冲动，也使得企业源源不断地支持科技革命，可能在某些领域率先突破，赢得预期利润。市场部门的那些与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相关的就业人员，在数字社会的建设逻辑中，其收入必然会高于其他部门——这是创新的必然。如果创新部门不能获得回报，只是增加成本，这不符合企业的逐利价值观。而创新所形成的无人车间与自动化技术，会逐步压缩制造业对普通工人的招工规模。最先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替代的工种，一般是技术含量和劳动复杂程度较低的职业与工种。这就要求对那些被颠覆性技术挤垮的行业进行有计划的改造，对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进行新的转岗培训，对深受产业转型影响的低收入群体进行社会政策支持。这是从原有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所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政府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承担更为主要的职责，以保护为“颠覆性创新”所“破坏”的原有就业人员，减少科技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为保持高质量发展、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就需要在一次分配中维护好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维护好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严格根据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在2022年升级为全国统筹之后，保证企业按照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按照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16%足额缴纳，这既有利于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也有利于当前养老保险的足额发放，促进代内与代际公平。

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占比会趋于上升。笔者以为，中等收入群体还不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中产阶层。现代化过程经常伴随着中产化过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的社会明显不同。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时俱进地提升治理能力，正如我们不能用农业社会的治理策略治理工业社会，我们也不能用工业社会的治理办法治理现代后工业社会或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与中产化过程交织在一起，使其发生了很多本质变化。社会的中产化、网络化和圈层化，极大改变了个体的社会心态与心理结构。网络化的人，在信息传播中已经将自己转化为信息中心——既是大众信息的生产中心，也是大众信息的传播中心。在平台算法改变信息消费者的信源结构的同时，个人也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信息交往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结构。当前，社会的网络化和圈层化结构在同时形塑我们的社会。

网络化和圈层化结构，与原来的社区化和社会化结构不同。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我们必须提升治理能力，当前的重点就是推进法治化。在网络化世界，人人可以成为“精英”，也因此，现在无论多么美好的“示范图像”，中产化的大众都很难全盘、机械、轻易地接受，而是会通过自己的圈层加以反思，甚至解构“示范图像”。也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我们必须将工业社会的秩序观升级为数字社会的秩序观。因为在现代化推动的中产化社会到来之后，原先单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会被社会个体反身性建构与再建构。在大数据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社会个体与社会组织的圈层化，还会产生思想的圈层化。每个人在自己的圈层中，都以自我为中心生产信源，其通过自我的选择，屏蔽某些信源，传播某些信源，在点赞与反对中形成“后真相时代”的信任偏好逻辑。就此而言，“得网络者更容易纵横天下”。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文化与自媒体的这种变化，并研究与这种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治理策略，才可能更好地适应并推动我们所处时代的现代化发展逻辑。

学术的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系教授

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平等化，以及用科学、经济、理性等概念取代传统思想和信仰模式。这种文明与进步的观念是为欧洲人所传播并不断丰富的。人类有不同的探索道路，不同的发展模式，有时形式虽然相同，但内涵差异巨大。就历史维度而言，今日中国式的现代化就人口数量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是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就道德层面而言，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文明发展新形态需要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这是摆在学者面前的时代使命。

现代化需要学术的再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依靠自然科学技术，而且依靠哲学社会科学。仅仅将知识创新理解为理工科的发展进步，而忽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不重视人文学科，是片面的、肤浅的、短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者、概念的构建者、知识的生产者、思想的传播者，更是人类精神的滋养者、世界公民的培育者，离开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很难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学术的再现代化，就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人类其他文化遗产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发展，构建学术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思想。如何构建中国式学术现代化的问题，就是回答如何建设自主知识生产的问题、如何提升资政服务能力的问题、如何进行有组织的科研问题、如何概括我们的社会实践问题和

理论凝练问题、如何建设三大体系的问题。其归根到底，就是回答全球变化、全球冲突中的中国学术如何领先的问题，如何为世界思想库提供大量可供借鉴资源的问题，未来在世界学术体系中是否有绝对影响力的问题。“鉴古



知今、彰往察来”，我们必须了解当代世界学术的现状、思考现代西方学术构建的历史过程、理解西方学术与现代世界之间关系等问题，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基本的判断，对未来拥有切实可靠的展望。

学术理路与自主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自主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具有世界性、引领性的现代化，在这种发展模式下，要成为新型的创新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要理解现在、把握社会变迁的方向，就需要深入掌握社会变迁的长期进程。只有站在历史的视角……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的独特性、动力和惯性。”^①先进与落后都是暂时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永远的落后。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300年

① 德兰迪、伊辛：《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第 565 页。

② José Rabasa, Masayuki Sato, Edoardo Tortarolo, Daniel Woolf,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3: 1400–1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

③ 见研究西班牙帝国的著名史学家 (David Ringrose) 的论述，如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 1200–1700* (Pearson, 2000)、*Europeans Abroad, 1450–175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8) 等。

④ Eric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antheon Books, 1968, p.11.

⑤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2 页。

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①据岛田虔次估计，至 1750 年以前，在中国一地印刷出版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了全世界同时期所有其他语言出版量的总和。而且，历史著作在所有出版类型中数量最多。^②早期近代欧洲比较贫穷，其工业和军事技术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但并不明显优于非洲或亚洲技术。1700 年之前世界各地社会之间是相对自治、相互依存的。^③那时的我们还是领先的，但为什么在这之后就逐渐落后了呢？换言之，为什么欧洲在近代崛起了呢？这正是彭慕兰之问：尽管欧洲和东亚的先进地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持续的工业增长开始于西北欧？为什么彼时还是农耕社会的君主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很快就称霸世界了呢？也许是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流动工人来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基础，民主的根本理想是自由，享有政治的自由，资本与民主彻底颠覆了欧洲王室的制度基础，使欧洲引领了近代历史。1750 年是关键年份，18 世纪是关键世纪。“众所周知，船舶和海外贸易是英国的命脉，海军是其最强大的武器。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英国拥有约 6000 艘约 50 万吨的商船，是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商船的数倍。1700 年，这些船只可能占有所有固定资本投资（除房地产外）的十分之一，其 10 万名海员几乎是最大的非农业工人团体。”^④18 世纪的英国战胜了欧洲对手，成为欧洲最杰出的殖民国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欧洲 1850 年时的所有优势都产生于 1750 年以后的发明——仍然需要

问一问这种创造力突然爆发的基础是什么。”“1750 年以后最佳技术的加速传播和新的发明创造的爆发，都应该归诸……在 1750 年前的 150 年中形成的‘科学文化’要素，特别是在英格兰，这些要素包括：越来越强的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科学社团的发展，比较容易听懂的公开演讲等等。”^⑤被称为“光明世纪”“理性世纪”的 18 世纪，是欧陆思想家梦想的一个光明时代正在实现的世纪，这是现代世界的转型期。此时大清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帝国、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处于鼎盛时期，但启蒙运动挑战了一统欧洲天下的基督教思想，民主思潮逐渐出现，随后在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中达到顶峰。商贸促进技术的进步，科学理念影响社会各个层面，这是工业革命的萌发时期，导致了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奴隶贸易和人口贩运在大西洋两岸扩张。新古典主义盛行于欧洲各地，东方世界的物品传入欧洲，异域风情大为流行。通商、贸易、传教把这些观念带到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地。这些变化影响着东方世界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东方世界越来越处于守势。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兴起的前奏。

知识与学术是现代西方世界合法性的重要支撑，欧洲人将之灵活运用于各种场合。现代世界合法性的根源是复杂的，轨迹是交错的，呈现形式是多样的，通过传教、学校、医院、出版、建筑、艺术等手段传播，他们的知识与文化、宗教与信仰、物质与制度，散布于世界各地。其大致的学术理路如下。

其一，西方文化的形成漫长而久远，这是从单数希腊到复数西方的复杂过程，每个时代都有文化传承与文化接力者。接力既是同一时空下的同辈竞争，更是如何交接下一棒的问题，是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国家、没有终结的智力竞赛，就看谁能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跑出人类的福祉。东方世界是西方古典文明之源，希腊文明是在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基础上兴盛起来的，欧洲文明之根在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世界。古代近东孕育了犹太教—基督教—神教宗教传统，希腊罗马世界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这是理解宇宙的两种不同方式：宇宙是如何运作的、宇宙是

否有意义、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等。古代罗马进行了西方最早的“民族国家”的失败尝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到中世纪，这两种理解方式与日耳曼传统相融合，形成了今天西方文明的雏形，这就是长期垄断欧洲思想的教会文明。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影响下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开启了现代政治的先河，也把欧洲文明的火把传到美洲，大大拓展了欧洲文明的内涵和空间，使美国成为西方文明的潜在旗手。西方文明向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使其得以“现代化”，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西化的世界。毋庸回避的是，目前美国仍然是持棒领跑者。我们能接棒领跑吗？中国学术完全有这个能力，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对域外文明开放包容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尊重对手、学习对手、研究对手，取决于国家如何制定适合现实的、宏观长期的战略规划。

其二，欧洲最早的海洋探险始于1433年葡萄牙勘探非洲西海岸，并在西班牙环游全球后的1519—1522年间达到顶点。16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兹·戈马拉将伊比利亚人的海洋探险比作“创世纪以来除了耶稣诞生和去世之外最伟大的事情”，^①从而开启了近代西方“四大发现”的时代，即时间、空间、自然、文明的发现促成了西方在近代的垄断地位。发现时间，一是史前史的发现，打破了上帝造人的宗教时间观念，历史时间回到人间，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时间概念。二是他者时间的发现，人类有不同的计时方式。每个事件、人类行动、思想、知识体系和文化形态，都存在于时间中，并且有着一个有限的开端与终结。^②各种历史分期精彩纷呈，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发现空间，被称为探索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也是新航路开辟的时代。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地球全貌得以全面呈现，全球空间概念逐渐形成。发现自然，伴随扩张而来的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动物、植物，人们认识到了新环境、新地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自然知识，激发了人们征服自然界的雄心

壮志。发现文明，人类第一批古老的文明，因各种原因逝去了，不为后人所知，这是人类文明发展非连续性的一个特点。拿破仑远征发现了罗塞塔石碑，逐渐打开了古代埃及文明之门；英国外交官莱亚德于1847年发现了尼尼微遗迹；德国人施里曼于1873年找到了古代特洛伊遗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被认为是现代进化论科学的奠基文献。^③丰富多彩多样的古代文明、远古人类向世人诉说着他们的智慧。

欧洲强大的象征是坚船利炮，实则是科学、技术、知识、学术在支撑他们的扩张，这其中自然科学的作用，更有人文学者的作用。1822年商博良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预示着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强势崛起。这是西方现代的合法性，他们善于制造国际性的学术话语，从地中海世界到大西洋世界莫不如此：世界性的学术，既制造身份认同，又掌握了话语权。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完全依赖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全新的欧洲、非洲、美洲的大西洋社会。

其三，宏观来看，西方文化形态已经历了“自由的审美文化”“信仰的宗教文化”“知识的学术文化”三个阶段。“帕提依神庙和谐的轮廓象征着古代希腊的古典精神：相信人类智力将给世界带来秩序，艺术能够捕捉人类形体和感觉的本质。在古代雅典的巅峰，这种精神传遍了整个地中海，成了后续文明用以衡量自身的标准。”^④这是他们的审美文化。宗教是建立在经验层面的情感、行动和信仰的一种社会关系，是面向更高的现实，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是对永生、救赎、重生、轮回等状态的执念。这些信仰带来了各种宗教实践，

① Lynn Hunt, Thomas R. Martin, Barbara H. Rosenwein, R. Po-chia Hsia, Bonnie G. Smith, *The Making of the West Peoples and Cultures*, Bedford/St. Martin's, 2009, pp.421-422.

② 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32页。

③ Stanley A Rice, "Origin of Species," in *Encyclopedia of Evolution*, by Stanley A. Rice, Facts On File, 2007, p.303.

④ 菲利普·毕肖普：《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陈永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① 艾伦·麦克法兰：《文明的比较：中国、日本、欧洲，以及英语文化圈》，荀晓雅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第160页。

② Christopher Dawson,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The Classic Study of Medieval Civilization*, Image Books, 1991, p.224.

③ 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如崇拜、祈祷、冥想、净化、布道、学习、牺牲、朝圣、慈善、治疗、驱魔等。这是不可回避的一种人类现象。“基督教的影响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欧洲和英语圈的居民中，植根于我们对罪与恶、是与非、思想与行为的信仰中。我们的诗歌、戏剧、小说受前两千年的基督教遗产或明确或含蓄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基本法则随后被一些欧洲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采纳和修改。”^①对道森来说，中世纪基督教为西方灵魂注入了一种精神关切，“除非西方人自己被彻底否定或毁灭，否则永远无法完全消除”。^②这是他们的信仰文化。

“四大发现”的知识化、学术化、学理化，特别是随之而来的知识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极大增强了西方力量。“四大发现”奠定了近代欧洲的霸权基础，扩张之后给西方世界带来了高度自信——我来、我见、我征服。他们制定了文明的标准：语言、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证明了进步观念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一条不间断的直线，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不过是西欧民族智慧的一部分。^③这是他们的学术文化。当今的人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虚拟的网络空间是第五大发现，数字的元宇宙文化“未来已来”，我们处于另一种“大分流”状态。如果我们成功地找到方法来解决文明的冲突，支撑全球化不断延展下去，引导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将有一个更加宏伟的未来。但如果我们失败了，则可能会走向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因此，我们要用智慧和技术来改变世界，在信息时代建立一个更兼容、更包容、更平等的数字文明，消除全球知识、学术、文化的不平等。

学科建制与知识的跨国流动

截至2019年，中国有近3000所大学，普通高校教职工256.67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74.01万人。而美国有学位授予的大学近4000所，如果按照每所大学有1000人配置的话，美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师有400万人。就绝对数量而言，中美已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的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据国际出版协会估算，全球每年出版新书总量约为220万种。截至2022年，全球出版业的市场规模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我们出版物的绝对数量尽管已处于领先地位，但学术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达到领先，出版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国际出版所占比例太少、教辅出版太多。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近7万种学术期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期刊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每家出版社的出版重点不一样。出版学术期刊总量超过一千种的有荷兰的爱思唯尔、德国的斯普林格、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美国的约翰·维利，其中爱思唯尔拥有近2000种。以出版学术图书为主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学术期刊分别为300余种、200余种。而中国目前还缺少类似规模和体量的出版社。中国当下大约有6449种学术期刊，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共有2400余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CSSCI来源学术期刊567种，其中历史类3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相较之下21世纪以来几个主要国家新创刊的史学刊物情况中，韩国142种、美国113种、法国84种、德国29种、日本24种、英国16种，而中国只有《历史评论》《经济社会史研究》《世界历史评论》《台湾历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几种。

可见，在人才培养、学术出版、知识生产、学术平台等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当下的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学术准备，以期在数字时代大分流中赢得先机，逐渐成为领跑者。三大体系建设是漫长的工程，是要靠几代人甚至几百年才可能见效的。我们要梳理各个学科建制的由来与发展，尤其要研究西方的学术发展经验与教训。学术务必交流、必须互鉴，只有在竞争、

比赛中才能发现不足，才能激发前行的动力，才能拓展自身的能力。出版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向世界汲取人类智识。我们需要放开学术期刊，搭建更多的国际性的学术平台。放手让学者去参与世界学术竞赛，赢得自信、赢得尊重。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更多的文科人才，需要培养精通国际事务、懂国际组织管理的专门人才。我们既需要做大学者的队伍的基础，也需要培养更多的战略科学家；不但要培养埋头苦干的学问家，更要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战略科学家；我们不但需要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也需要康德、黑格尔式的思想家，更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天才；我们的一些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院尤其需要转型，从培养听说读写、精通语法语音的人才转型到培养精通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再到培养善于进行数字集成的全球研究大家。巨大的精神运动都是从微小的起源中产生，知识生产、学术发展也不例外。学术的追求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确定性。国际学术要求克服空间问题，超越民族国家，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一切以长远计，尽量少考虑眼前的利益。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培养队伍，搭建平台，搞好传播，赢得未来。

阿克顿勋爵说：“两个伟大原则分割了世界，并争夺主宰权：古代和中世纪。这是在我们之前的两种文明，也是我们的文明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所有的政治和宗教问题实际上都归结于此。这就是贯穿我们社会的伟大的二元论。”^①这种二元文明社会至今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引擎，影响世界各国。近代五百年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五百年，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五百年，是带来创伤与发展的五百年。殖民化导致了对他者的否定，其不是因为他者缺乏文化价值，而是因为这些地区没有能力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如何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审视西方历史相互联系的多元叙述所创造的普遍主义？^②如何避免一个地区的发展导致另一个地区的不发达这一折磨人类历史的不平等现象？如何避免世界体系形成核心/外围的等级制度？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经济、知识、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再生产和转变的基本过程、内在规律和特征，探索并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全人类的任务，当然也是我们的职责。无论如何，未来

的文明都是在密切互动中形成的，各民族之间尽管具有独特性的一面，但是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交融的结果必定是思想包容的多元性，这是未来人类共同文化的特质。

人类发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全球都在探索，我们是探索中的一份子，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体系来阐明人类的未来：打破资本世（Capitalocene），在人类世（Anthropocene）创造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去世前，曾与亲密盟友一起呼吁“工人和人民”建立“第五国际”，以协调对进步运动的支持，帮助人类面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社会。“统治资本的战略已然全球化，这要求其受害者的反击也要全球化，何不酝酿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力量，确保各国取得反资斗争的胜利。”^③

1650—1700年的世界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未来。第一个未来，即1750—1950年，欧洲人利用他们在1650年取得的脆弱优势，将他们的目标强加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第二个未来，也就是我们刚刚进入的未来，可能会看到大型和有活力的文化重新建立平衡，这是典型的世界长时段历史。^④这个时代已经到来，面对文明新形态的“知识状况”与“世界状况”，重新构建世界学术体系已成为可能。知识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自行流通，不受国家边界的阻碍，是社会高度成熟、社会高度自信的表现，这是成功的关键。让我们的思维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偏见，未来属于那些有战略定力的国家。

① 阿克顿 1859 年的未刊稿，见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12.

② 比如，西方文明的天才在于它对理性和信仰的独特综合。希伯来圣经对一个合理的造物主的启示，使犹太教和基督教充满了对世界是可理解的信念，导致了西方理性的绽放和科学的发明。启蒙运动发生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中，这并非偶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都是大课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而不是简单批判和彻底否定。人类各个民族历史中所蕴含的智慧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③ 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沈雁南、彭姝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

④ David Ringrose,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 1200-1700*, Pearson, 2000, p.xv.

世界文明浩浩荡荡，在曲折中不断向前；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在求索中走向成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版图的重要构成，是对世界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营建。从历史哲学与世界文明史的维度认识、理解中国式



世界文明史意蕴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价值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奏开始加快，变迁的速度以百年计。但这个阶段的文明仍然具有深刻的探索、试错性，文明进程往往周期性地被动荡、战争等打断，甚至出现文明的倒退。

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现代生物与医药、大容量及快速交通、计算机与互联网、大都市与全球城市、跨国企业与国际组织、现代国家与全球治理等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营建文明的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人们对文明的本性、方向、营建方式等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人类文明进入了快速更新、全球互通的阶段。这个阶段，变迁速度以十年计，文明多样性以裂变、指数的方式推进。但周期性的波动、危机、局部性战争、区域与全球性争端从来没有消失，世界文明仍然面临危机与风险。

简要回顾世界文明的变迁可以发现：一方面，文明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展开、深化的过程。文明的内容、形式、结构、关系不断多样化、复杂化，器物、精神、社会、制度、生态等文明不断发育；文明日益成为人们追求确定性、营建美好生活的自觉方式，借助文明发展，人们营建起更为美好、更有确定性的生活。另一方面，确定性、多样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其脆弱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不断转换。人们对文明发展的方向、方式、结构、路径等并没有形成真正规律性的认识与共识，文明发展、转换、竞争的成本巨大，各类文明冲突一直存在甚至可能随时恶化、激化。

当今世界文明的总体格局仍旧复杂多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选择与抉择以规律把握、理性自觉为基础。在成就与问题、摸索与试错的统一中，人们一直在努力追问与希望确认文明是什么，主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世界文明理性自觉的方法论价值

石器与陶器、乡村与城镇、财产与分工、统治与压制、语言与文字、艺术与宗教等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文明的早期阶段，人们开始对文明是什么进行了内在观念性沉思与外在器物性营建。在世界文明的早期，推进步伐相对缓慢，变化速度以千年计，器物、观念、行为、秩序等文明相对原始、粗糙，人们对文明的沉思也相对初级、混沌、原始。铜器与铁器、城镇与城市、阶级与行会、管理与治理、机器印刷、专业艺术、现代宗教等的出现，标志着世界文明进入快速推进的阶段，人们开始对文明的本质、要素、结构、主体、目的、路径等进行更为自觉的理性反思与多样对象性营建。这个时期，文明进步的节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要包括哪些内容？谁是文明的创造主体，推进文明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谁？如何理解、处理不同文明体间的关系？推进文明的要素自觉、形态自觉、关系自觉、主体自觉、目的自觉，对于推进文明合理安全、风险与代价可控的发展具有基础意义，而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世界文明的理性自觉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为推进文明的总体自觉提供方案

近代以来是世界文明加速推进的时代，各类文明冲突频发的时代，也是人们对现代化、世界文明及其关系进行多样化思考的时代。经过数百年的试错、反思，人们日益发现：现代化是文明的现代样态，推进现代化是不同区域与国家在文明竞争中的必然选择；但是，现代化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具体样态、路径、方式等是唯一的。

一方面，文明样态具有多样性。从采集狩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是文明变迁的主要阶段，但在每个阶段，文明的具体样态都具有多样性，采集狩猎、农耕、工业、数字文明的具体形态有强烈而鲜明的区域与文化特点。另一方面，文明变迁路径也具有多样性。从一个文明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跃升与转换，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体，其具体路径与方式具有鲜明的差异。比如，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从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其路径、特点就差异巨大。

现代化是文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是文明共同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推进现代化既需要把握实践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更需要尊重文明构成样态与转换路径的多样性。但现实中，一些主体对现代化的理解往往以一元论、线性论、自我中心为底蕴，倡导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者，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西方化、欧洲化，就是世界不同区域与国家全面采取西方化的制度、思想、生活方式。这种非多样性、一元决定论的所谓现代化，理念上同文明的构成规律与变迁趋势相背离，实践上会放大已有文明纷争，导致新的文明冲突。

现代化研究与实践需要文明自觉，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推进文明的总体自觉提供了重要方案。

第一，其对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确认。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等问题的全面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国自身文明道路的探索，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不仅反思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文明道路问题，也反思了世界的现代化与文明道路问题。其重要意义在于对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进行了确认：一方面，现代化是世界文明的历史趋势，任何一个国家脱离了现代化轨道，都将被历史淘汰；另一方面，世界文明只有以多样现代化为特征，才有可能实现低风险、良性可持续发展。

第二，其对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内容进行了历史确认。文明是一个逐渐打开的过程。在文明早期，文明以一种混合的方式存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为一体。随着历史推进，职业与分工的不断细化、能力与行为的不断提升与专业化，文明逐渐分化为器物、秩序、社会、文化、生态等样态，并不断产生新的要素、内容、结构。从总体趋势看，不仅文明的领域不断多样、分化，文明的每个领域也呈现出精细、分化的趋势。这就需要人们对文明内容不断进行过程性确认，科学统筹、系统推进文明进步。从区分与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区分与统筹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文明，并以开放务实的心态推动数字文明、交叉文明等新型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的内容与趋势进行了开放性、动态性确认，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特点。

第三，其对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目的进行了历史确认。在客观进程意义上，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文明的创造者、现代化的主体。但在现实资源配置、权益享有、权力运行等问题上，人民的主体地位往往得不到有效实现，这是一个历史难题，也是世界文明、现代化周期性出现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在理念层面确立了人民的历史、文明、现代化主体地位，还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政策、机制，努力使人民真正成为发展成果的共享主体，成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现代化的目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主体地位在理念与制度、目的与手段上的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核心优势之一，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质量、文明高度。

探索人民至上、开放包容、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样态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的历史、创新、创造过程。农业文明相对于采集狩猎而言，是现代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是现代的；现代生态文明、数字文明、消费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是现代的。随着宇宙、工程、交通、生命、量子等宏观、中观、微观科技与文化的推进，完全有可能产生生命文明、量子文明、交叉文明等新的文明内容甚至文明类型。因此，我们需要以开放、弹性、包容的态度，不断探索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开放包容、面向未来的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新样态。

第一，进一步厘清现代性与文明性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性是文明性的当代打开，文明性通过现代性得以实现，不能适应现时代、顺应现代性潮流的文

明可能成为失落的文明。另一方面，文明性作为一种创造性积累、历史性智慧，对现代性具有鉴别与规范作用，现代性作为竞争语境下的新求索，在创新创造的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试错性，只有符合文明总体趋势，文明规律的现代性才能够持存，并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文明总体进程中的重要构成，能否处理好现代性与文明性的关系，将深刻影响中国及世界文明的走向。

第二，进一步处理好文明之目的与推进方式的关系。一方面，人民是现代化、文明的根本主体、根本目的，从理念上确认人民的历史主体、文明主体地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共识。另一方面，如何从机制上真正实现人民的文明主体地位，仍是一个世界性的实践难题。其原因是复杂的：文明始终处于变化与转换之中，面临各类具体、复杂性问题；人民的利益存在长期、短期等区分。因此，如何在此过程中保障人民的文明主体地位和人民的利益，就成为一个理论性很强、但操作性更强的问题。能否在操作层面、具体问题层面实现人民的文明主体、现代化主体地位，也将深刻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与水平。

第三，进一步处理好文明传承与开放互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深厚、绵延的中华文明传统为根基的现代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华文明本身的多样性、丰富性、绵延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处理不当，文明的丰富、深厚、绵延，也可能生成某些排斥域外先进文明甚至夜郎自大的心态。文明史告诉人们，一旦保守封闭就会落后。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机制与行为上把开放包容、文明互鉴落到实处，是保持中华文明先进性，建设高质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当然，在推进开放互鉴、践行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也需要始终保持文明自信、价值自信，坚守自身的文明主体地位，坚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智慧、有弹性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开放与坚守的关系，将深刻决定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地位与未来命运。

法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蕴意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意义，强调它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对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和周密安排，尤其是阐明了法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应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表述和学者的解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各项元素。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元素；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且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中国特色；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科技创新赋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的现代化，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类法治文明中重要一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集大成）的基本属性；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通融合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全球化、国际化以及融入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先进属性。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巨大作用。

法治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规范有序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通过科学立法可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规范有序进行。而在科学立法方面，习近平有非常系统的论述，他指出：“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法律。一个是

要适时制定新的法律，一个是要及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现在“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



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①而科学立法的目标就是达到“良法善治”。

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坚持党的全方位领导，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需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这就需要国家根本法宪法来予以规定和明确（1982年宪法颁布后所经历的五次重大修改，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干部队伍建设，需要法治政府、阳光政府、服务政府等的建设，这就需要加强行政立法，完善行政法治，最近两年学术界关于编纂行政法典的大讨论就是回应这一社会需要的重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涉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等各个领域的建设，既需要民法、商法、经济法、科技法、教育法、文化产业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引领、规范和调整，也需要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的全力保护；中国式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9—20页。

- ① 参见章志远：《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理论》，《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
- ② 《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年，第8页。
-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
-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 ⑤ 参见翟国强：《行政诉讼制度功能展开的宪法基础重思》，《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

现代化的推进，其根本目标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加大公益诉讼保障人们绿色生活的力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还需要处理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需要加大国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营造一个和平、协调、诚信和安全的国际环境。

法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除了加强科学立法之外，还需要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这一点离不开严格执法，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

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工程，是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时代精神和实践伟力的主要场域。政府严格执法，履行其各项法定职能，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途径，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10年来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论及严格执法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实践要求和推进措施，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严格执法理论。^①

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政府职能建设方面。如形成政府的组织、行为、程序、责任和救济等各项法治在内的全方位建设理念，用以引领和规范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一体建设。尤其是在服务政府建设方面，如同党的

二十大报告所总结的那样，必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②其次是落实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执法效率。通过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促进各类信息技术与数字方式适用于行政权，提升行政执法的公正、效率与精准度。

法治排除中国式现代化的阻碍因素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各种矛盾和纠纷也会层出不穷。此时，法治的保障功能就开始凸显：通过法律的实施，法治体系的推进，对各种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排除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各种阻碍因素，为其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排除中国式现代化进展的阻碍因素，必须坚持公正司法，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③“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④如果失守，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因此，随着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新时代对公正司法也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三个领域的创新。

首先是行政诉讼法治建设领域里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处理好行政诉讼类型化，如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这是近20年来学术界的主要议题之一。二是从宪法解释学角度，进一步强化中国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定位。以《宪法》第41条为依据，塑造了当下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新型结构：相对人权利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合法性审查。^⑤三是逐步确立（法院认可）和完善（法理指导、立法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四是强化2015年《行政诉讼法》在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启动方式、转换条件等方面的制度设定，并增设当事人的异议权等。

其次是民事诉讼领域里的创新。一方面，推进民事诉讼法典化，以完善程序法治，向良法善治的境界推进。另一方面，推动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等的法理研讨和立法完善工作，以消除对电子数据认知上的误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此外，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须紧紧围绕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来建设智慧法院、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并推进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减轻法官等审判人员的工作负荷，减少积案，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

再次是刑事诉讼领域的创新发展。一是进一步妥善处理好控辩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控辩关系一直在以控辩平等为追求，沿着从“法制”转向“法治”的轨道，并表现出正向的、积极的、合乎诉讼法治规律的发展。^①二是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推动了个人信息保护从私法、实体法领域向公法、程序法领域延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赋予了诉讼主体更多权利，遏制了政府信息处理行为的不当扩张，弥补了国家保护义务的体系疏漏，从而成为今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的重要内涵。^②三是将人工智能引入刑事诉讼，充分做到司法数据共享化、办案材料数据化、法律决策智能化，以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质量、减少司法腐败，克服控辩不平等、压缩辩护空间、司法能动性受限等缺陷，以强化人权保障。^③

通过上述行政、民商事、刑事之三大诉讼领域的创新，逐步建立和健全实现公正司法的体制和机制，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法治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热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必须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而

法治通过落实全民守法这一环节，将全体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之中，以推进这一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全民守法。”^④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习近平强调：“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⑤“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⑥“法治的根基在人民。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⑦

全民守法的前提，就是全社会信仰法治。习近平指出，“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⑧全民守法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出于内心认同的自觉守法，一种是法律强制力威慑下的被动守法。只有信仰法治才能自觉守法。而民众信仰法治，其前提有四。一是法律是切实保护人民之各项权益的良法，且方便民众遵守。二是政府的执法是严格且温情的，这里的严格不是严厉，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而使法律具有公信力；温情即执法是文明的，是有温度的，是人性化的。三是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是公平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人民群众能够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中体会到司法公正。四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① 参见冀祥德：《从控辩关系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演进发展》，《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1期。

② 参见王仲羊：《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3期。

③ 参见白文静：《刑事诉讼人工智能化转型研究》，《学术探索》2022年第3期。

④⑤⑦⑧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23页，第275页，第276页，第218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94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①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的工作重心在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



过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规范界定、强制惩戒、激励引导、约束监督等功能，以高效的自我革命坚定地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政治保障

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规范界定功能，以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要承担起领导国家政权的重任；也是长期领导党，要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其中，制度现代化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自我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党制度规范体系

周敬青，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

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不仅构成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为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制度支撑。

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人类社会基本规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基石。制度的规范界定功能可以将公权力的行使控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而提供明确具体的行为指引和行为标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党内法规制度不仅是管党治党的基本遵循，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载体。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②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整体上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党的意志和主张的体现，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规范党的工作活动，科学塑造党员行为的重要依托，保证党的政治理想、执政理念和立党宗旨的践行和落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政治底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中居于首位。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助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违纪违法行为，有助于消除党内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确保方向正确

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制惩戒功能，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方向不移，道路不偏。

制度是以强制性方式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存在物及社会关系的总和。法规制度是在反复试错和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理性成果，是实现权力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根本遵循。制度通过一些禁止性规范、惩罚性规范抑制，反对某些反向消极行为，及时有效止错纠错惩错。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此才能从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表现出极强的纠错和自我修复能力。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③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的“八项规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导属性层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围绕夯实现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道路属性层面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政治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立场属性层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战略布局扎实落地，必须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聚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用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成功实践，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偏向、不脱轨、不走样。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集聚 中坚力量

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激励引导的功能，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聚集中坚力量。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以及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激励褒奖积极行为，规范塑造组织行为。党内法规具有激励引导功能。通过制度的方式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让广大党员干部的聪明才智充分涌动，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党内法规是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管党治党的利器。完善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环节工作制度，全方位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通过党内法规制度，构建一套系统而稳定的奖惩机制，使得党内成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团结，增强其政治荣誉感。党内法规制度中应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同时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切实做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科技、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优化人才培养、发现、

引进、使用和评价、流动、激励机制等，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当下，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不拘一格，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聚集中坚力量。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形成 权威高效的监督力量

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约束监督功能，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就是推进生产关系的优化变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使公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规范、制约和监督，能够使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能够使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广大党员的行为更加规范、有序，从而增强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给出了“窑洞之对”的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新时代党又给出了“窑洞之对”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监督制度融入党和国家

治理体系，设立国家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四梁八柱’初步建立，党的自我革命监督网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④为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将“一把手”作为监督重点，强化对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情况的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促进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党成功走出一条反腐败之路。尤其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规范问责促进担当作为。同时，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完善问责情形，严格问责程序，精准有效问责。“五年来，全国共问责党组织3.9万个，问责党员领导干部、监察对象29.9万人。”^⑤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总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为着力点，把自我革命的成功做法和新鲜经验提炼集成、固化深化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制度规范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使得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更加稳固，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研究”(21ZDA121)前期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第6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④ 杨晓渡：《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1日。

⑤《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

过程一主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四组关系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意义深远、继往开来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既植根于“历史过程”，与近年来不断深入研究、阐发、宣传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密切联系，又建基于“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道路”概念有15次，其中最重要的统揽全局的道路是“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报告中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的历史主动，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主动”相结合，百余年的历史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四组关系富有广阔而深入的阐释空间。

主动研判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格局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凭空发生，而是由本国、本民族的人口、地理、文化等要素构成其现代化展开的起点。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在走过百余年的历史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抓住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疆域幅员辽阔的基本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基本抓手，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人口多、地方大的特点造成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比如，人口多，大家都能温饱就很不容易；地方大，各地区发展就必然有参差与不平衡。但人口多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享受全球产业链中人口红利的可能，地方大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抗击打能力强和各类

型资源的极大丰富。所以，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会停留在概念的顾影自怜和理论的空想玄思之中，始终主动研判国情，进而从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格局是“既不好高



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每一步都紧密联系着国情，也都在根本上遵循着国情。

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官、绅、民之间也就此建立起了各种密切的有机联系。但是在近代，中国被列强拖入他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渐渐被淡忘，“官民一体”的治理体系渐渐被废弛，官、绅、民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在此过程中被一条条切断。这表现在近代中国一批批有识之士虽然不断地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案，也在不断实践救亡图存的方案，但与人民始终隔得很远，更谈不上以人民为中心。比如戊戌维新，其依靠的基础力量是一部分趋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的中高级官员和一部分刚取得功名、试图走上层路线的年轻读书人。辛亥革命的基础力量主要来自晚清新学堂之学生、留日之知识分子、清末新政期间编练的新军和游弋于社会边缘的会党。这些力量都有改变中国之志，也使中国的一些局部发生了变化。但由于这些力量与人民隔得很远，意味着其并无改变中国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与前述这些力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主动以人民为中心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首先追求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实践中，“新中国”不能是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能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新中国”也不能是半封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不能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穷苦的工农不能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每天生活在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阴影中和时刻受到“高等人”剥削压迫的危机中。这两个目标实现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这只是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步。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来说，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标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远未达到。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探索。1958年毛泽东同志即强调当时的中国仍是“又穷又白”，因此“穷，就要革命，就要干”，通过党带领全体人民苦干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这种让国家变大变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迫切愿望推动着新中国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正因为太过迫切，加上当时的中国时刻处于帝国主义会“突然袭击”的紧张氛围中，我们的发展也不免经历一些艰辛的探索

和前进中的曲折，但无可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各种基础特别是工业化基础正是在此时奠定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发展，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着力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初见成效。

和平发展之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模式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不止一种模式，但曾几何时现代化被认为只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是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只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而把全球不断推向暴力深渊的“老路”。走过这条“老路”的国家损人利己，甚至损人而不利己。被拖进这条“老路”的国家，则饱尝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带来的血腥罪恶与深重苦难。

回望百余年历史道路，中国人对这条“老路”的认识和批判是渐渐清晰、渐渐深刻的。在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并未批判这条“老路”，反而要全面拥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去建设所谓军国，幻想成为“列强”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被中国人认为代表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欧美“列强”燃起战火，扭杀一处，不止不休。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在瞿秋白看来，以后世界的发展若不改一个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孙中山在谈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时亦说：“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国家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

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毛泽东同志曾言：“世界主义是什么？就是四海同胞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在“四海皆同胞”“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基本关

照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倡议与实践“一带一路”，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亚洲论坛，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准则构筑新型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新的百年，中国会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文明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角度，中国传统中多有义利之辨，在义高于利的基本思路下，虽然经济常有发展，市场也蓬勃兴旺，但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始终未将物质的富足放在国家发展、人心伦常的优先位置。进入近代，前述的情况发生倒转。舶来的金铁主义、物质主义等说凭借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大肆传播，进而因为时局的失措而大获认同。乱世中人多以利益为驱动，以物质为追求，遂导致贫富差距严重、精神力量匮乏。同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虽然打倒剥削阶级、消灭贫富差距的目的非常明确，但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后，物质和精神之间究竟应该是何关系却经历过艰辛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①我们认识到没有物质基础谈不上现代化，因此要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断去夯实各种物质条件；同时没有精神支撑也谈不上现代化，更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赢方面对世界既有现代化模式做第一重超越。

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角度，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但在百余年历史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此的认识是渐渐步入正确轨道的，采取的措施是渐渐强而有力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讲求天道、人道与自然之

道的互通与互补。但世界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除了给世界上的人带来血腥罪恶与深重苦难外，亦给这个世界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和难以预期的后果。国人对此曾有认识的误区和行动的错误，讴歌过排放滚滚毒烟的烟囱，赞美过废水如潮的工厂，向大自然的索取不知控制，对环境的破坏缺少节制。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会在国人走入误区时予以警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发展让我们有了讲求生态文明的大格局和大视野。从此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层面有了对世界既有现代化模式的第二重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百余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让中国人创巨痛深的“人民蒙难、国家蒙辱、文明蒙尘”。经过百余年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中国人民从不断蒙难到富了起来，国家从历经蒙辱到强了起来，蒙尘暗投的文明浴火重生，演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锚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下一个百年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新的历史锚点。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把新的历史伟业镌刻在新的历史道路之上。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页。



党的二十大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应有之义，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生态意蕴，反映了我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良好生态、美



“三重和解”何以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蕴的价值指向

金瑶梅，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解。这一提法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恩格斯则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②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的和解”进行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除了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身的和解也应当是“在场”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

人与自然的和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原初意蕴且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从渔猎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尊崇与膜拜，到农耕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依赖与依附，再到工业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压榨，直至生态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珍惜与关爱，人类在由野蛮走向开化、开化走向文明、文明的初级形态走向文明的高级形态的历史变迁进程中，看待自然的视角经历了一个从仰视到平视、从平视到俯视、再从俯视回归到平视的过程。

虽然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全速推进之后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它们国内的生态环境在表面上呈现良好的态势，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其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也不能抹去其在工业化的特定阶段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这一史实。关于后者，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鞭辟入里地点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的反生态性。这一批判秉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贯风格，即一方面肯定工业文明在历史进程中替代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合理性与先进

丽环境的需求，直面生产发展与生态恶化这一传统症结，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以切实行动应答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将群众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民至上”这一原则的坚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注定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基于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的具体国情与全球生态危机频现的外部环境。只有通过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永续发展。我国当下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价值指向十分明晰——使“三重和解”在未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成为可能。“三重和解”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身的和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第63页。

性,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基于资本无限扩张本性之上的,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其必然导致自然本身的发展难以为继,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升级。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人的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大肆张扬、人对自然资源的“属人式的占有”,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传统的相容型转变为冲突型,原本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对象的自然日渐被物化、原料化。

西方式现代化对自然的贪婪索取一向为人所诟病,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则表征了现代化范式的多样性、可供选择性及转换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兼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提倡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多重意义:既表达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向往,对西方发展观的回应,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的继承,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中对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回归。以长远的目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生态意蕴使人与自然的和解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问题,他们根据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特质,作出了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判断,这一判断极富远见。当下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还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全然和解,但这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如果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充分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那么共产主义终将成为无法企及的“乌托邦”,人与自然的和解也将无法真正到来。

人与人的和解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服务的群体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旨在服务于民,始终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的直接驱动力。而西方式现代化主要服务于少数资本家,一贯推崇的是“资本逻辑”与“金钱逻辑”,谁主导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本,拥有巨额财富,谁就成为现代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的自始至终是“人”,而西方式现代化聚焦的则是“钱”。

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本国的生态危机转

嫁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新型的殖民手段,即“生态殖民”,全然不顾发展中国家资源日益趋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社会现实。从全球范围来讲,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人凭借手中占有的大量资本享有良好的生态产品、优良的生态环境,而大部分人丧失了生态权益,成为被生态帝国主义者奴役的对象。长此以往,必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深,从而不仅使人作为“类”意义上的自由解放沦为空谈,更助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背离、异化与恶化,使我们离“异化的彻底扬弃”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终极目标愈来愈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人”。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主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生态红利的现代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的基石不断夯实,用完备的法治强化生态治理,主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人民群众这一包含无数个体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一视同仁待之,这样的现代化无疑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良好生态的现代化。从国际视角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之后,我国积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不断践行这一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含生态意蕴,毕竟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与“人一自然生命共同体”紧密相连,才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范式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也有助于实现人与人的真正和解,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①

依据全球生态正义,尤其是代内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4页。



平和代际公平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跨越种族与国别的藩篱，在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体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也应当资源共享、命运与共。富有生态意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现代化，聚焦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生态利益，但并不囿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在为 14 亿多中国人民谋求生态福祉的同时，亦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具有中国温度、中国情怀的方案与智慧。一条向着“人与人的和解”不断趋近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定会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最终和解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与自身的和解

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化、信息化、智慧化浪潮势不可挡，世界性的重大疫情和局部性的战争又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的变数。当人类告别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被快节奏的工业文明所包围、浸润之际，人与自身的和解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强势掠夺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传统纽带出现了部分断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物的占有不均而呈现紧张态势，人的内在需求众多，但却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一一得以满足，如此种种势必加剧人内心的迷茫、焦虑与无措。西方式现代化推崇人对物的无节制占有，试图在物的占有数量和人的幸福指数之间划等号，事实已然证明，这一做法并不可取。其不仅会直接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枯竭，也会无限制放大人的贪欲，使人性中向善的一面被遮蔽，人

会因过度崇尚对物的占有而反过来被物所支配。换言之，当人类劳动的成果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掌控人类本身之时，人的自我异化就不可避免。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里将会扬弃一切形式的异化，包括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自我异化的终结意味着人与自身的和解。值得一提的是，人与自身和解的重中之重是劳动的解放。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自由自觉的活动视为人的本质，也就是将兼具自由和自觉双重特质的劳动提升到人的本质这一哲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类劳动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规定性之一，因此，人与自身的和解必然涵盖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现代化新道路强化劳动的生态向度，彰显劳动的生态意蕴，有助于实现作为目的本身和人类本性的劳动，倡导进一步回归本真意义上的劳动，使人对人的本质的不断确证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交织在一起。当然，当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中的劳动尚未完全脱离“谋生手段”这一特定属性，但是劳动的这一特质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驱动下的异化劳动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以“主人翁”的姿态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其自主性、自律性、自我实现性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所不能比拟的。相信随着富有生态意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劳动的生态向度将进一步得到强化，我们离劳动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将越来越近，而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最终解放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彻底扬弃，将宣告人与自身和解的真正到来。

[本文系 2022 年上海哲社一般项目“‘双碳’背景下上海建设生态宜居人民城市的重大举措研究”(2022BKS004)；2022 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双碳’背景下生态文明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022-S-036) 阶段性研究成果。]